

FGS

Frontiers of Global Sinology

FGS, Vol. 1, No. 1, 2026, pp.47-55.

Print ISSN: 3106-5503; Online ISSN: 3106-551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g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gs260105cigt>



副文本视角下《围城》德译本的跨文化阐释

马梦茜 (Ma Mengxi), 刘红卫 (Liu Hongwei)

摘要: 本文以《围城》德译本为研究对象, 在副文本理论框架下, 系统探究了内副文本的跨文化阐释功能。通过对封面、作者前言、后记、再版说明、注释及参考书目等内副文本形式的分析, 本文认为《围城》德译本的内副文本构建了德语读者理解作品所需的语境预设,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化的解释, 补偿了文化缺省所造成的理解障碍以及在德语国家语境中塑造了作者与作品的文学形象。研究表明, 副文本引导德语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作品, 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

关键词: 《围城》; 副文本; 文学翻译; 跨文化阐释

作者简介: 马梦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电邮: 383875946@qq.com。刘红卫 (通讯作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 现当代英国戏剧,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电邮: liuhw@zuel.edu.cn。

Titl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A Paratextu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unction of the peritex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aratext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eritext form such as the cover, the author's preface, the afterword, the reprint notes, the annotations and the bibliograph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ritext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constructs the cultural context presuppositions required for German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work, compensates for

Received: 30 Mar 2026 / Revised: 25 Apr 2026 / Accepted: 26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the comprehension barriers caused by cultural default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language culture, and shapes the literary image of the author and the work in the context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aratext guides German-speaking reader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promotes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Fortress Besieged*; paratext; literary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uthor Biographies: Ma Mengxi,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Research Areas: English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383875946@qq.com. Liu Hongwei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Research Areas: English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British Drama,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liuhw@zuel.edu.cn.

引言

钱钟书所著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作品，小说标题“围城”深刻隐喻了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置身于物质及精神之困境。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部小说更被视为“融汇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经典之作。”（高旭东、戴波，2017，pp. 66-67）

《围城》自1947年出版以来便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随着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作家不断走向世界，《围城》也逐渐被译介到海外，目前已有英语、法语、德语等10多种译本。其中，《围城》英译本于1979年出版，开启了《围城》国际传播的历程，使得海外读者开始认识钱钟书和中国现代文学。《围城》的德语译本最初于1988年由德国岛屿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SchirmerGraf Verlag再版。《围城》德译本出版后，《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德国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并给予高度评价。本文选取2016年4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首部汉德双语版本 *Die umzingelte Festung*（*汉德双语*）中的德语译本为研究对象。该译本采用了德国汉学家莫宜佳（Monika Motsch）与史仁仲（Jerome Shih）的经典译本，于2009年荣获法兰克福书展颁发的德国“Jane Scatcherd 翻译奖”，并于2011年被提名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目前，国内学界针对《围城》德译本的研究较少，主要聚焦于《围城》德译本的译文分析，通过具体例句来探索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语言处理方式。（王静，2012；陈敏，2023；王波涛，2019）此外，国内研究也关注到了《围城》德译本在德语国家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情况。（朱琳、余承法，2024；杜蕾，2023）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国内对《围城》德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文的正文部分，对原文本及译文副文本的关注不足。因此，本文通过分析 *Die umzingelte Festung*（*汉德双语*）中德语译本的封面、作者前言、后记、再版说明、注释和参考书目等内副文本，探讨该书的内副文本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引导德语国家读者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作品，丰富读者对译本整体性的认识，深化人们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中副文本重要性的关注。

“副文本”（paratext）概念最早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意指“围绕正文存在、影响读者阅读方式的一系列附属文本和非文本形式，如书名、前言、后记、注释和访谈等。”（Genette, 1997, p. 1）Genette（1997, p. 7）将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与“外副文

本” (epitext): 前者与书籍的物理形态紧密结合, 直接出现在文本之中; 后者则存在于书籍之外, 如访谈、书评及媒体评论等。在文学作品向外传播的过程中, 副文本是出版内容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文学作品。在翻译语境中, 副文本的功能尤为重要。正如肖丽 (2011, pp. 17-20) 所述, “副文本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翻译研究的界限, 揭示社会环境对译作的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 副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发挥形象构建的作用。正如贺显斌 (2017, pp. 43-47) 所表明, “翻译副文本不仅参与建构异国和异域文化形象, 也可以在译语文化中塑造和传播原作形象、原作人物形象、原作语言形象等”。由于译本面对的是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读者, 译文正文之外的副文本能够补充正文信息、增进读者对原作历史背景的了解, 读者也会因此构建对异国文化的认识。在跨文化视域下, 黄晓敏和刘红卫 (2025) 对文学人物伦理身份重构的探究路径, 为本文从跨文化阐释角度分析译者副文本中的作者形象提供了有益参照。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 通过前言、注释和后记等副文本形式, 译者或出版者能够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本土化阐释。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或出版者会更深入地了解异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 更清晰地向读者传达作品的主题思想, 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传播。

基于此, 本文以《围城》德译本的内副文本 (包括封面、钱钟书撰写的前言、译者莫宜佳撰写的后记、再版说明、注释和参考书目) 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语境的预设、文化缺省的补偿和文学形象的建构三个方面, 探究这些内副文本是如何在德语语境中对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诠释, 引导目标读者理解作品所呈现的复杂文化内涵。

一、文化语境的预设

“文化预设是指生活在同一种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共享以潜在形式存在的假设、信念和观点。” (Eugene Nida and William Reymann, 1981, p. 14) 也就是说, 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人们会面临文化预设的理解问题。因此,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 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目的。正如王敏和罗选民 (2017, pp. 92-93) 所述, “译者需要充分了解原作文化和目的语读者的文化, 推动目的语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文化预设”。《围城》德译本的封面、作者钱钟书撰写的前言和译者莫宜佳撰写的再版说明为德语读者进行了文化语境的预设。

《围城》德译本的封面去除了作家和作品的标签, 强化了大众文学作品的色彩, 使得德语读者更加愿意开始阅读和反复精读。封面在视觉传播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胡清韵和谭渊 (2021, pp. 109-110) 所述, “好的封面的设计能够准确传达出书籍的内容, 反映出译者和出版社的想法, 吸引更多的读者”。如图所示, 《围城》德译本的封面主色调为灰色, 与城墙的颜色相符合。封面将蓝色与灰色相搭配, 给人以宁静和沉稳之感。中文标题《围城》、汉德双语版本、德语译者信息和出版社名皆为蓝色。其中, 中文标题《围城》辅以蓝色城墙的图案, 醒目且突出, 读者能够快速捕捉到标题信息。最右侧的城墙设计也呼应了这一点。作者信息和德语标题 *Die umzingelte Festung* 为白色。一左一右, 形成对称, 强调了这本书的双语版本。正如 Genette (1997, p. 1) 所表明, “副文本是正文本的‘门槛’。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 必须先理解封面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同时, 如图所示, 《围城》德译本的封面十分简洁, 只有中文和德语版的作家名和作品名, 没有类似“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最佳翻译奖”这样的标签定义。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文化他者性, 在德语读者与中国文学作品之间形成平等、友好的交流, 减少文化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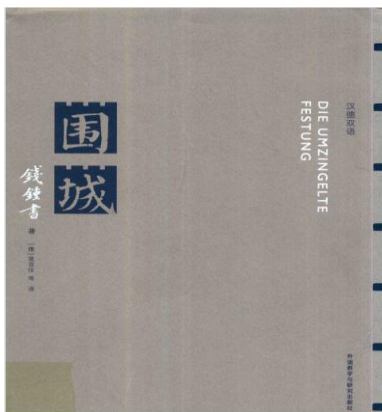


图 1:《围城》德译本封面

Figure 1: The cover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围城》德译本的作者前言分为作者钱钟书对全体读者和德语读者的说明。在作者于 1946 年所写的笔者序中，作者介绍了《围城》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德语读者能够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作品的性质。作者钱钟书（2016, p. 236）在序言中表明“《围城》书写的是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¹这点明了他的创作目的。在这一说明中，钱钟书弱化了《围城》的政治背景，强调这一作品揭示的是普遍人性。作品的政治性不强，德语读者便更容易理解且更愿意接触小说的主题。同时，钱钟书叙述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围城》。“两年里他忧世伤生，屡想中止。”（2016, p. 236）《围城》发表时间为 1946 年，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社会变革加剧，中国人民积极探寻未来的发展道路。由于担忧战争局势和民众安全，钱钟书放缓了写作的节奏。通过阅读作者对全体读者的前言，德语读者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生成了认知。此外，在作者于 1988 年所写的对德语读者的说明中，钱钟书并没有重复叙述写作背景，而是着重叙述了译者莫宜佳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她对《围城》德译本所做出的贡献，体现出了译者莫宜佳和作者钱钟书之间的友好关系。钱钟书对莫宜佳翻译缘由的说明实际上拉近了德语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高深玄妙的误解增强了莫宜佳博士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她对中国近代文学有广泛而又亲切的认识，善于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2016, p. 607）这句话点明了译者莫宜佳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热爱，能够进一步引起德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增强德语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信心。

译者莫宜佳于 2008 年撰写的再版说明更加全面、清晰地表现出了《围城》的社会背景，德语读者更能理解中国的文化语境。当时，距离《围城》原作 1946 年首次出版已过去 60 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译者莫宜佳（2016, p. 597）表明“《围城》是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社会的生动描绘。然而，与大多数关于那个时代的叙事作品不同，此书并非从某种坚定的政治或共产主义视角出发撰写，而是摒弃了高昂的社会激情，以机智和讽刺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这一叙述进一步印证了这部小说的弱政治性，易于德语读者阅读。此外，莫宜佳提到《围城》体现出了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围城》处理了一个核心主题，即本土旧有文化与外部侵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

¹ 本文有关《围城》德译本的引文均来自 Monika Motsch（2016）：*Die umzingelte Festung*（汉德双语）：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突。小说不只是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简单对比。它所呈现的并非是文化冲突，而是不断展现出具体而微的中西文化交汇点。”（2016, p. 597）这句话中对中西文化共通点的表达与全球化中互利共赢的思想相契合，德语读者更乐于去阅读。“我们不仅能在《围城》所描绘的、象征人类自私本性的著名‘猴子尾巴’中找到中国人的影子，也能在自己身上发现它。”（2016, p. 597）这句话映照了《围城》中书写的是贪婪自私的普遍人性，不带有强攻击性色彩。

综上所述，《围城》德译本的内副文本封面、作者前言和再版说明能够帮助德语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理解小说的文化预设、搭建阅读框架，引导德语读者探索中国社会背景和小说的真实性质，增进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二、文化缺省的补偿

“文化缺省是指在交际过程中，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会心照不宣地省略彼此都知道的语篇外的信息，这样能有效地提高交际效率。”（王东风，1997, pp. 56-57）然而，在遇到文化缺省现象时，与作者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往往无法领会作者的省略意味。因此，译者在补偿文化缺省现象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译者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原作的文化缺省现象，而且需要设身处地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再运用适当的处理策略向读者传达原作的术语内涵和文化意义。

译者莫宜佳于1989年所写的《围城》德译本的注释补偿了德语读者遇到的文化缺省现象，向德语读者解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围城》德译本共有30条注释。其中，18条是专有名词解释：包括人名、书名等，8条是典故：包括古代故事等，2条是双关语，2条是谚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交际成功的关键。译者莫宜佳对《围城》中与中国历史相关的概念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释，这些概念包括中国建筑、典籍、人物和典故，如敦煌石窟、《永乐大典》、太平天国运动、《三宝太监下西洋》、“新生活运动”、方孝孺、孟尝君、佛祖舍身饲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永乐大典》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收录了超过两万卷内容，涵盖儒家经典的注疏以及历史、哲学、艺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论著。它于1403年至1408年间为明成祖（永乐帝）编纂而成。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军队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其大部分被毁或运往欧洲。（2016, p. 598）德语读者阅读这个注释时不仅能够了解《永乐大典》这本书，还可以认识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以及近代中国的状况，了解到中国的悠远历史。佛祖舍身饲虎暗指一则佛教传说，见于《六度集经》。传说古时有一位佛教圣者想要弃绝尘世，便退隐山林。每当圣者看到生命受苦时，便会出手相救。一天，圣者正在寻找野果时，遇到一只母虎，因饥饿、疲惫与过度兴奋，在哺乳后竟想吃掉自己的幼崽。圣者流泪，感到无限悲悯。由于母虎只食肉，圣者决定以身相饲。圣者将头颅伸入猛兽口中，以求速死而无痛苦。母虎与幼崽因此得救。（2016, p. 602）莫宜佳对这个典故的解释与对敦煌石窟的解释相契合。敦煌石窟便存有舍身饲虎壁画。德语读者通过阅读这两个注释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体会到中国兼收并蓄的历史文化。

《围城》德译本的注释为德语读者构建了文学互文系统。“互文性是指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Julia Kristeva, 1969, p. 146）也就是说，一篇文本中有时会提到其他多种文本。作者将这篇文本与其他文本相结合共同阐释主题思想，表现出深层的内涵。译者莫宜佳向德语读者解释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学典籍和诗文，体现出了《围城》的互文性，促使德语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围城》描写的核心群体）的文化语境，如文言文、弗里

德里希·冯·罗高、“R”是狗鼻子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窈窕淑女”、《儒林外史》、“九宫格”、斯多维尔勋爵的原则、“有美玉于斯”、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第九行、“Sweets to the sweet”。“R”是狗鼻子音出自佩尔西乌斯《讽刺诗》第一首，第 107 行及后文：“Sonatic de nare canina littera”（此处响起来自狗鼻子的声音/字母）。（2016, p. 599）结合原文出处来看，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张先生讲英语不伦不类，内在思想迂腐、外在崇洋媚外。莫宜佳在注释中加深了钱钟书想要表达的讽刺意味，深化了德语读者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有美玉于斯”戏谑地暗引《论语·子罕篇·第十三章》。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力主出售美玉，意在表示君子不应埋没才华，而应出仕为政。用在王美玉身上，“沽”便有了新的含义。（2016, p. 603）作者暗指美玉应无瑕，但《围城》中的王美玉却是一名风尘女子，具有极强的反讽意味。莫宜佳也在注释中暗示了这一点。德语读者通过这个注释能够领会到中国经典文学典籍的魅力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含蓄却意味深长的文学表达。

《围城》德译本的注释使德语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国家的文化内涵和特征。译者莫宜佳为德语读者描绘出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如麻将、“拚盘姘伴”、斜川刚作的诗、“呕出尔乃沃”、虱子奥林匹克、还要你烧锡箔去赎罪、分家不分家、“忠”字是心上一个中字。麻将在西方常被称为 Mahjong。四人用 144 张牌进行游戏，是西方多米诺骨牌的一种复杂变体。人们若想要赢牌，不仅需要运气，还需要大量练习，尤其是出色的记忆力。麻将是中国的国粹，人们热衷于此，并且常常下高额赌注。多届中国政府都曾试图禁止，但收效甚微。麻将也被视为一种性格测试，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太太向她未来的女婿提议玩一局。方鸿渐在这场测试中完全失败了。（2016, p. 599）莫宜佳详细叙述了中国人民对麻将的喜爱以及麻将所承载的丰富内涵。这增进了德语读者对中国人民娱乐活动的了解。还要你烧锡箔去赎罪是指根据一种地方迷信，男人被女人打耳光是不祥之兆。他只有向财神烧香祭拜（此处“烧锡箔”指焚化纸钱祭神），才能避开即将降临的灾祸。显然，这种事时有发生，故而形成了这句谚语。（2016, p. 603）烧锡箔纸是中国民间祭奠祖先、神灵以及逝去的亲人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一注释，德语读者能够明了中国谚语的来源以及中国人民生活中蕴含的语言文化。

尽管《围城》德译本的注释不多，但是通俗易懂，能够弥补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知识认识的不足，解决德语读者在阅读正文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问题和文化障碍，助力德语读者形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生活文化更深刻的认识。

三、文学形象的建构

《围城》德译本的封面、译者莫宜佳撰写的后记和参考书目在德语国家语境中建构了作者钱钟书和《围城》的文学形象。这里的文学形象是指作家和作品在某种文化中的文学身份和文化定位。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对原文本作者和作品文学形象的阐释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促使读者形成文学认知。译者莫宜佳在读者阅读完正文后通过内副文本后记和参考书目建构了钱钟书和《围城》的文学经典定位。

莫宜佳于 1989 年所写的后记通过文学评价巧妙地建构了钱钟书和《围城》的文学形象，并且推动了《围城》在德语国家语境中的经典化历程。文学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作品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得到大众的认可。正如金宏宇（2012, pp. 177-180）所述，“副文本是文本经典化的重要

推手。副文本具有纪实性和真实性，一般是由与作者相熟的师友即时写成，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在后记中，莫宜佳叙述了自己与钱钟书的交流经历，描述了钱钟书的家庭，强调了钱钟书对书籍的热爱，概述了钱钟书兼具艺术性与学术性的作品以及他的追求。莫宜佳以钱钟书好友和学术同伴的身份详细介绍了钱钟书的生平和成就，有助于增强叙述内容的真实性，德语读者更能亲身体会到作者钱钟书的形象。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里劝阻一位英国女学者来访，理由是：“假如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得认识下蛋的母鸡呢？”（2016, p. 579）这暗示了读者不必深究作者生平和荣誉，应关注小说文本本身。正如钱钟书（2016, p. 579）所说，“无论作为作者还是学者，我都甘心守着自己一方天地，独自耕耘那片小小的园地”。这些表述在德语读者心中建构了谦虚平和的作者形象。莫宜佳并不吝啬对钱钟书的文学评价，她认为钱钟书“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2016, p. 581）以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2016, p. 582），在德语国家语境中塑造了钱钟书的文学地位。此外，译者莫宜佳介绍了《围城》多样化的社会评价，促使德语读者客观地理解《围城》。1983年法国《世界报》赞其值得获诺贝尔奖，另一些人则因其愤世嫉俗的厌世态度而排斥它。（2016, p. 582）人们称赞《围城》的两点：一是其机智与讽刺，二是对西方文化的涉猎。（2016, p. 582）除此之外，莫宜佳还提到了小说与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的联系，引导德语读者深入思考，吸引更多德语读者阅读《围城》。书中将婚姻与生活视为“围城”的观念，令人想起叔本华的论点，即所有美好的希望都以失望告终，人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不断摇摆。尤其是人作为“孤独的刺猬”这一意象，可追溯至叔本华一个著名的比喻：他将人类社会比作一群刺猬，因需要温暖而挤在一起，却又因刺扎疼痛而立刻分开。（2016, p. 589）这一联系使得德语读者更易理解《围城》的主题思想和文化定位。

莫宜佳于1989年首次撰写、于2008年二次编写的《围城》德译本的参考书目，列出了与钱钟书和《围城》相关的研究文献，塑造了《围城》的学术性特征。莫宜佳在参考书目部分不仅叙述了作者钱钟书的主要著作，还列出了关于钱钟书和《围城》的研究性文献，如夏志清的《钱钟书》（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伦敦，1971年），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钱钟书》（特怀恩出版社，波士顿，1982年），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5年）等。这些参考书目使得德语国家读者能够多维度地了解作品创作中、学术研究中和日常生活中的钱钟书，更成为了研究这部小说的重要历史文献。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围城》德译本的内副文本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地探讨了译本内副文本封面、作者前言、后记、再版说明、注释和参考书目的形式以及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阐释功能。研究发现，《围城》德译本的内副文本主要通过预设文化语境、补偿文化缺省以及建构文学形象，在读者进入小说正文之前、之中、之后向德语读者阐释钱钟书的文学身份和《围城》的文学意义，引导德语读者深入探索《围城》的内涵和当代价值、体会中国文学作品的魅力，促进跨文化文学传播。毋庸置疑，这部小说的副文本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除了内副文本，仍可以进一步拓展对译本外副文本（如书评、译者访谈等）的研究，更全面地探究《围城》在德语国家的接受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译者或不同语种的译本，从跨文本的角度深入探讨《围城》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呈现方式。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Ma Mengx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4390-2521>

Liu Hongw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3775-1286>

References

陈敏 (2023): “《围城》德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学教育 (下)》(05): 177-179。

[Chen Min (2023).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Literary Education* (05): 177-179. DOI: <https://doi.org/10.16692/j.cnki.wxjyx.2023.05.016>]

杜蕾 (2023): “《围城》德译本的接受与创造性叛逆”, 《文学艺术周刊》(04): 50-53。

[Du Lei (2023). “Reception and Creative Treason i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Literature and Art Weekly* (04): 50-53.]

Eugene, Nida, William, Rebyurn. (1981).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Orbis Books.

高旭东、戴波 (2017): “从钱钟书的《围城》看中西方文化精神的融汇”, 《山东社会科学》(02): 66-72。

[Gao Xudong, Dai Bo (2017).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pirits in Qian Zhongshu’s *Fortress Besieged*.”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02): 66-72. DOI: <https://doi.org/10.14112/j.cnki.37-1053/c.2017.02.007>]

Gérard, Genette.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贺显斌 (2017): “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副文本对作品形象的建构”, 《上海翻译》(06): 43-48。

[He Xianbin (2017). “The Role of Paratext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a Work: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06): 43-48.]

胡清韵、谭渊 (2021): “《西游记》德译本中副文本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研究”, 《中国翻译》(02): 109-116。

[Hu Qingyun, Tan Yuan (2021).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mage through Paratexts in German Translation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02): 109-116.]

黄晓敏、刘红卫 (2025): “从约束到自主:《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珍妮特的伦理身份重构”, 《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2): 247-257。

[Huang Xiaomin, Liu Hongwei (2025). “From Constraint to Autonomy: The Reconstruction of Jeanette’s Ethical Identity in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2): 247-257.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7>]

金宏宇 (2012):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06): 170-183+209。

[Jin Hongyu (2012). “Paratext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06): 170-183+209.]

- Julia, Kristeva. (1969). *Bakht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Seuil.
- Monika, Motsch. (2016). *Die umzingelte Festung (汉德双语)*.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王波涛 (2019): “阐释学翻译观视阈下德译本《围城》语言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 《中国民族博览》(16): 103-105。
- [Wang Botao (2019).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Language-Specific Cultural Items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China National Exhibition* (16): 103-105.]
- 王东风 (1997): “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06): 56-61。
- [Wang Dongfeng (1997). “Cultural Default and Coherence Re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06): 56-61.]
- 王静 (2012): “以《围城》德译本为例浅析文字游戏的翻译”, 《中国翻译》(06): 99-101。
- [Wang Jing (2012). “On the Translation of Wordplay: A Case Study of the German Vers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06): 99-101.]
- 王敏、罗选民 (2017): “文化预设与中国神话的多模态互文重构——以《山海经》英译为例”, 《中国外语》(03): 92-100。
- [Wang Min, Luo Xuanmin (2017).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and Multimodal Intertextu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ythology: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3): 92-100.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7.03.017>]
- 肖丽 (2011):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 《上海翻译》(04): 17-21。
- [Xiao Li (2011).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04): 17-21.]
- 朱琳、余承法 (2024): “《围城》在德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外语与翻译》(01): 16-22。
- [Zhu Lin, Yu Chengfa (2024).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Fortress Besieged* in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01): 16-22. DOI: <https://doi.org/10.19502/j.cnki.2095-9648.2024.01.003>]